

重返1960年代：“夏伊洛公园”和“退修会”中的婚姻伦理反思

Back to 1960s: Reflections on Marital Ethics in “Shiloh” and “The Retreat”

曾玉玲 (Zeng Yuling)

内容摘要：美国当代小说家鲍比·安·梅森在其短篇小说集《夏伊洛公园》中试图通过描写美国南方乡村婚姻生活，探究美国当代婚姻危机与1960年代思想运动的关联。本文选取该小说集中的关键篇目“夏伊洛公园”和“退修会”，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论证夫妻间矛盾的根源并非来自生活方式的差异，而是婚姻观念冲突，即：以爱为本的当代婚姻观念与以责任为本的传统婚姻伦理之间的冲突。反文化运动和女权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美国传统婚姻伦理，但在建构新型婚姻伦理方面存在不足和片面之处。

关键词：“夏伊洛公园”；“退修会”；鲍比·安·梅森；反文化运动；婚姻伦理

作者简介：曾玉玲，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当代英美文学。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西方伦理批评文献的整理、翻译与研究”【项目批号：19ZDA29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Back to 1960s: Reflections on Marital Ethics in “Shiloh” and “The Retreat”

Abstract: In short story collection *Shiloh and Other Stories*, contemporary American novelist Bobbie Ann Mason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ontemporary marital crisis and the ideological movement of the 1960s through the portrayal of marital life in the rural South of the United States. Taking the key stories “Shiloh” and “The Retreat,” this paper will argue that the root cause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does not arise from the difference of life style, but the conflict of marital concepts, that i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ontemporary concept of marriage based on love and the traditional marital ethics based on responsi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o some extent, the counterculture and feminist movements have deconstructed the traditional marital eth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are insufficient and one-sided in constructing a new type of marriage ethics.

Keywords: “Shiloh”; “The Retreat”; Bobbie Ann Mason; countercultural movement;

marital ethics

Author: Zeng Yuling is Ph.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Contemporary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zengyuling995@163.com).

鲍比·安·梅森 (Bobbie Ann Mason) 的短篇小说集《夏伊洛公园》 (*Shiloh and Other Stories*, 1982) 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现代化进程中南方乡下的家庭婚姻生活。其关键篇目“夏伊洛公园” (“Shiloh”) 和“退修会” (“The Retreat”) 中的两对夫妻双双陷入中年婚姻危机: 丈夫们对妻子尝试新的生活方式和塑造全新女性身份的行为感到困惑, 加之经济压力和情感问题, 夫妻之间的分歧逐渐加剧, 使得本就不稳固的婚姻关系摇摇欲坠, 接近破裂边缘。梅森将这些故事命名为“夏伊洛公园”颇有深意。作为历史文化遗址, 夏伊洛公园不仅可以理解为丈夫和妻子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冲突, 还可以理解为以爱为本的当代婚姻观念与以责任为本的传统婚姻伦理之间的矛盾。现存研究多从文体写作视角展开, 致力于解读小说的极简主义风格和开放式结尾, 仅有少数文章探讨其人物的性别身份和主体性问题, 但对其中隐含的婚姻伦理及其历史渊源讨论较少。不难发现, 梅森对当代肯塔基州小镇生活的描写受到成长过程中各类文化运动的影响¹, 因此, “夏伊洛公园”和“退修会”中两对夫妻面临的婚姻问题或与反文化运动和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相关。本文借助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身份”等相关概念, 探讨两对夫妻在1980年代陷入婚姻困境的原因, 解析反文化运动对当代美国婚姻伦理的影响, 并由此反思1960年代各类思想运动在伦理重构过程中的偏颇与不足。

一、20世纪80年代: 举步维艰的婚姻困境

“夏伊洛公园”中的夫妻常年分居, 如今的朝夕相处揭露并激化了两人之间潜在的分歧与矛盾。丈夫勒罗伊是卡车司机, 妻子诺玛是化妆品店店员。勒罗伊和诺玛自结婚以来长期租房, 缺乏物质基础。特别是, 勒罗伊因事故居家休养, 更是加重了经济负担。勒罗伊本想借休养陪伴妻子, 增加夫妻情感交流, 以弥补由丈夫角色长期缺位带来的情感危机, 但诺玛对此并未表现出喜悦。更加令勒罗伊感到困惑的是, 诺玛除了在化妆品店上班, 工作之余还参加创意写作班, 并每日专注于健身和尝试新的食物烹饪方式。这些新的生活方式令勒罗伊感到自己从未真正了解过对方。与此同时, 勒罗伊的行为在诺玛看来也令人费解。勒罗伊失业在家, 却整日沉迷手工、十字绣、搭积木等消遣活动。诺玛对此十分不满, 几度劝说他去找一些无需久站

¹ 参见 Joanna Price, *Understanding Bobbie Ann Mason*, 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0, 1。凡未特殊注明, 引文均出自笔者译。

的工作，但勒罗伊并未给予回应。长期的经济压力和孩子早夭早已动摇了二人的婚姻基础，而如今二人整日处于同一空间，相异的生活方式更是加剧了情感的疏离，威胁着本就不稳定的婚姻。

他们的婚姻危机不仅源于经济压力和相异的生活方式，更源于性别角色的颠覆。勒罗伊的休养实际上颠覆了家庭里的性别角色。他沉迷于手工制作、搭积木等传统意义上偏女性化的休闲活动，这导致他从一个在外挣钱的“大男子”形象转变成闲来无事的“被供养”的形象。反观诺玛，她致力于练习肱二头肌，呈现出具有力量感的强壮形象，工作之余还注重自我提升，试图塑造现代独立女性身份。性别角色的颠覆不仅给二人的交流设置了意识障碍，还阻隔了彼此沟通的欲望。格雷格·本特利（Greg Bentley）对此指出：“勒罗伊的伤口是一种心理症状，是他在家庭结构中被阉割的外化和表现，也是他在象征秩序中被阉割的心理表现”（144）。因此，诺玛的力量练习只会无限放大勒罗伊身体上的残疾，加剧心理上的自卑情结，进而导致勒罗伊交流上的无力感。当这种负面情绪投射到婚姻中时，双方会放大生活中的不满和矛盾。由此看来，这对夫妻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缺乏稳固的经济基础和情感纽带，二人的婚姻基础建立在年轻时残留的激情和多年的习惯之上。然而随着激情的消退，两人既难以回避婚姻中的现实问题，又无法找到内心的平静，导致他们在婚姻中无法获得幸福感，徘徊在离婚的边缘。

“退修会”中的夫妻同样难以从婚姻中获得幸福感，他们的婚姻危机与身份认同的缺失相关。“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3）。乔治安婚姻困境源于社会身份的错位。一方面，家庭主妇的身份在婚姻里无法得到丈夫的理解和认同；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工作，她在社会中难以确立个人身份，处于一种“无根”的迷失状态。丈夫谢尔比是一名牧师，连带着乔治安不得不参与教堂事务，担负起牧师夫人的角色。乔治安的生活围绕着教堂和家庭，几乎没有个人时光可以享受。但遗憾的是，乔治安的无私奉献并没有得到丈夫的回应和认同，这导致她很难获得个人的成就感和自我价值。更糟糕的是，她唯一渴求的情感需求恰恰是谢尔比所欠缺的。谢尔比是一个有计划且注重细节的人，处理事务主要依据事情的必要性，但这种理性的处理方式在亲密关系中反而适得其反。因此，二人总是争吵，婚姻关系一度濒临破裂的边缘。

他们面临的问题不同于因性别角色颠覆而引发的危机，而是由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所导致的婚姻困境。自20世纪中期以来，已婚女性的就业率不断攀升，女性逐渐成为劳动力的主力军。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乔治安不仅不能外出工作，还必须扮演好全职主妇的角色，依靠丈夫微薄的薪水维持家庭开销。乔治安难免感到自我身份的迷失，再加上她对家庭的付出并没有得到丈夫的理解和支持，由此乔治安对这段婚姻逐渐失望，试图逃离婚姻。小说中贯穿前后的“鸡螨”隐喻了二人的婚姻危机。谢尔比认为是鸡出了

问题；乔治安认为是人的问题，如同二人的婚姻，本质是彼此的沟通出现了问题。面对这个不可回避的危机，乔治安起初不忍杀掉病鸡，多次尝试解决问题无果后，在小说结尾乔治安冷静地处理了病鸡，“当斧头盲目地撞向鸡的颈项时，除了觉得完成了一项义务，乔治安什么感觉都没有”（186）¹。在这一刻，乔治安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主导权。

“夏伊洛公园”和“退修会”中的两对夫妻难以体会到婚姻的幸福感，妻子想要寻求新的生活方式，却无法得到丈夫的理解，而丈夫的生活理念也遭到妻子的不满，最终导致情感的疏离。格伦（Glenn）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对自己的婚姻‘非常满意’的比例显著下降”（转引自Amato 2）。梅森的作品也反映了这一社会问题，即当代婚姻的艰难状态和困境。保拉·盖兰特·卡德（Paula Gallant Eckard）对此指出，“梅森笔下的人物应对着恶毒而无情的变化。他们陷入了传统乡村社会让位于大众文化的动荡之中，他们的生活被不幸的婚姻、离婚、桀骜不驯的孩子、失业、疾病和衰老所困扰。他们的家庭和社区关系往往很脆弱，无法提供持久的连续性和稳定性”（90）。在不断激变的社会语境中，外部的社会结构和内部的家庭关系都处于嬗变之中，夫妻关系便是其中之一。

两对夫妻的婚姻处于举步维艰的状态，生活方式和婚姻观念的分歧成为冲突的导火索。夫妻之间没有关怀与激情，更多的是生活的麻木与隐忍。两段婚姻都呈现出焦灼的生活状态，平淡的婚姻表面下隐藏着彼此的不满与逃避。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婚姻状况相较于过去出现了不确定性。传统婚恋已不能很好地应对不断变化的现实社会需求和经济、文化发展。婚姻自古以来被看作一种社会制度，起到维持社会稳定、赋予人生角色的作用，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婚姻的稳定性逐年下降，婚姻中夫妻的幸福感也呈下降趋势，婚姻里的性别角色与社会历史语境的错位导致夫妻陷入婚姻困境。

二、夏伊洛之隐喻：婚姻理念的对抗

两个短篇讲述了夫妻面临的婚姻危机，这与书名《夏伊洛公园》的隐喻有所关联。作为历史文化遗址，夏伊洛公园有多重解读。桑德拉·安·桑德斯（Sandra Ann Sanders）认为它代表夫妻双方出现分歧，象征婚姻中的一方想要离开²；劳里·钱皮恩（Laurie Champion）认为它代表对身份和个人独立斗争的担忧³。在美国历史中，夏伊洛公园是南北战争时期夏伊洛和科林斯的

1 本文有关《夏伊洛公园》的引文均来自 博比·安·梅森，《夏伊洛公园》，汤伟、方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2 参见 Sandra Ann Sanders, “A Less Perfect Union: Bobbie Ann Mason’s ‘Shiloh’ and ‘The Retreat,’” *The Macksey Journal* 99 (2022): 2.

3 参见 Laurie Champion, “Bobbi Ann Mason’s (Open-Ended) Marriages,” *The Midwest Quarterly* 1 (2001): 95.

战场，夏伊洛战役¹曾在此地发生。夏伊洛战役是美国内战中最为惨烈的一场战斗，伤亡人数震惊了全国。²大约有 20000 人在夏伊洛被杀或受伤，而早先的主要战役加起来只有 12000 人”（McPherson 413）。夏伊洛战役作为内战中的关键战役，具有独特的意义，现已成为一个历史遗址公园。这个地方被称为“夏伊洛”是因为该地区有一座小型的原木教堂。“Shiloh”是希伯来语，意思是“和平的地方”。³讽刺的是，在这个和平的地方却发生了如此激烈的战争，梅森将这本短篇小说集命名为“夏伊洛公园”自然也含有此意。家庭和婚姻本应充满爱与和平，可在这平静的表面下，冲突与矛盾却暗流涌动。梅森借“夏伊洛”表明故事中的夫妻关系已进入到对峙最严重的地步，妻子与丈夫之间的冲突难以调和，婚姻处于举步维艰的状态。

夏伊洛战役除隐喻紧张的夫妻关系之外，还指向导致夫妻发生对抗的历史现实因素。夏伊洛战役是美国南北战争中的代表性战役，而美国内战爆发的原因在于南北制度的冲突与对立：“随着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南北两种制度之间矛盾的加深，以北部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和以南部奴隶主为代表的两派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也白热化”（王孝询 35）。南北战争的爆发，源于底层经济制度和上层政治因素的冲突，双方迥异的价值观导致内战的爆发。在一百年后的肯塔基州，新的“内战”也正在酝酿之中，不过这场内战发生在家庭内部，是丈夫和妻子家庭观念的冲突。这两对夫妻所面临的婚姻问题看似是生活方式的差异，实则是婚姻伦理观念的冲突。

两位丈夫对婚姻的认知与妻子发生了偏离，双方对婚姻的内涵持有不同看法。谈及婚姻，人们更多地将其与责任、繁衍、家族等联系在一起，“在多数历史时期中，假如人们根据像爱情这样脆弱又不理智的事物来选择他们的伴侣，将所有的性欲、亲密欲和成全他人的欲望都寄托在随之产生的婚姻之中，这种行为是不可思议的”（斯蒂芬妮·孔茨 3）。但是这种传统的婚姻观念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生转变，人们不再仅仅为了责任成婚，而开始追求以爱为本的婚姻，更加注重婚姻中的情感需求和身份认同。小说中的两位妻子便是为爱成婚的代言人，当初因年少激情成婚，如今诺玛和乔治安难以从婚姻中获得认同感，便萌生出结束婚姻的念头。诺玛在夏伊洛公园野餐时向勒罗伊提出“我要离开你”（18）时，此处的语气不是商量，而是通知，这表明诺玛已下定决心离开这段煎熬的婚姻。诺玛选择通知的地点也极具象征意味，夏伊洛公墓埋葬着战役中阵亡的士兵们，这个代表死亡的地点给诺玛提供了力量，因为死亡既代表着结束也象征着新生。对于诺玛而言，婚姻关系的结束代表全新的生活方式和女性身份的开始。同理，当乔治

1 夏伊洛战役又被称作匹兹堡登陆。

2 参见 David J. Eicher, *The Longest Night: 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E-book,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1, chapter 8, paragraph 27.

3 参见 David J. Eicher, *The Longest Night: 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E-book,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1, chapter 8, paragraph 8.

安被家庭事务磨灭生活的激情时，游戏机带给了她前所未有的新鲜感和生机感。在生活中，谢尔比“忙着参加讲座，忙着上课，乔治安在这些讲座和课程之间进进出出，好像在拜访别人的梦境”（182）。乔治安从未有过自己的生活，之前她赚钱供谢尔比上大学，如今又全职辅佐教堂事务，生活的缺失和丈夫的冷漠压得乔治安喘不过气。因此，当谢尔比提出他们不得不再次搬去另一个教区时，乔治安坚定地拒绝了谢尔比的请求。

当两对夫妻濒临婚姻危机时，妻子均选择结束婚姻，这不仅是她们个人的伦理选择¹，也是20世纪80年代婚姻观念的体现。“与过去相比，婚姻已成为成人生活中更自愿、更不长久的一部分”（Amato 1）。自中世纪至20世纪80年代，婚姻伦理已发展出了不同的形态：一方面，婚姻模式从传统的包办婚姻过渡到如今的为爱成婚；另一方面，人们对婚姻的期盼以及婚姻所扮演的角色都发生了改变。“在绝大部分历史中，婚姻首先并不是为了个人需要、男女之欲何后代繁衍。婚姻既与寻找终身伴侣、养育心爱的子女有关，也与获得优秀的姻亲、增加家庭的劳动力有关”（斯蒂芬妮·孔茨 VII）。直到18世纪后期自由恋爱的出现，人们开始寻求婚姻中的私人需求，逐渐认同婚姻最根本的基石是爱情。许多夫妻开始从政治经济的联姻中脱离出来，建立起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关系。但审视婚姻的历史可以发现，婚姻的约束力与稳定性却大不如从前。斯蒂芬妮·孔茨指出，“在接下来的150年里，社会努力在两种目标中取得平衡：一种是在婚姻中找到幸福，另一种是当婚姻不能满足人们对爱情的期望时，保留那些防止人们逃离婚姻的束缚”（VII），而这两种冲突正是这两对夫妻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

夏伊洛战役隐喻的婚姻伦理冲突便是以责任为本的传统婚姻伦理和以爱为本的当代婚姻伦理之间的矛盾。当婚姻从一种社会制度逐渐演变为浪漫爱情的私人缔结关系时，它所要求的责任感和约束力也愈发式微。两对夫妻以离婚结尾意味着婚姻伦理出现了新变化，传统的婚姻伦理要求夫妻双方以家庭为重，责任高于情感。而当代婚姻伦理以爱为本，当个人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时，结束婚姻关系便成了解决婚姻困境的新出路。

三、重返1960：婚姻伦理的重构与反思

“夏伊洛公园”和“退修会”中的两对夫妻纷纷陷入困境，最终都以离婚收尾，他们的婚姻结局可谓构成了美国当代的婚姻现状。从传统的婚姻伦理过渡到当代的婚姻形式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其中关键的转折点便是20世纪60年代。正如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分析和批评文学作品，对文学的解读和阐释不能脱离当下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否则

1 有关“伦理选择”，参见 Nie Zhenzh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5-386; 聂珍钊：“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向”，《文学跨学科研究》4（2022）：565等。

就会造成文学判断的伦理悖论。¹为了更好的剖析他们面临的伦理困境，我们需要从历史层面上来考察他们的情况。这两对夫妻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一个人20岁时形成的信念会终身留在他的世界观里”（麦隆·马格尼特 16），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正好遇到了60年代各种前卫的文化和思想潮流，如反文化运动和女性解放等运动。各类运动的目标和宗旨不同，但共通之处是挑战传统的伦理观念。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描述到“这代人是在富裕的假设和其对立面，即贫困、毁灭和失败的恐惧之间的极度紧张和令人心痛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12）。这种心理状态令他们渴望逃离父辈的约束和传统文化的牵绊，造就了他们叛逆和追求新兴事物的作风。

《退修会》中的乔治安决定嫁给谢尔比仅仅是因为他从商店偷了几箱可乐和一块火腿，她便被他的魅力所吸引。仔细审视这种魅力可知，吸引乔治安的并不是偷窃行为，而是行为背后所散发的叛逆和痞气。这正好与当时风靡的反叛遥相呼应，尤其是看到谢尔比阴沉的表情，乔治安便联想到詹姆士·迪恩式的沉思²。联系那个时期的美国社会现实，“在六十年代，生育高峰代宣告他们尤可动摇的立场，与‘体制’对立。他们摒弃物质主义和贪婪，拒绝麦卡锡时代的纪律和划一，并且开始建立一个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新世界”（约瑟夫·希斯 安德鲁·波特 8）。在那个年代，叛逆不是一种扰乱社会秩序的怪异行为，而是席卷整个青年群体的伦理风暴，他们追求特立独行和标新立异，所以乔治安才会被谢尔比所吸引。尤其当她得知谢尔比立志成为一名牧师时，“她被他的赎罪感和跟随主的召唤的决心深深打动，那时她就知道自己会嫁给他”（169）。谢尔比的赎罪感和宗教信仰并不与反文化运动冲突，因为“美国人笃信宗教是从殖民地时代就开始的，一直到现在，不论是世界观还是价值观，美国人的思维都与宗教息息相关。美国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基督宗教信仰是美国文化的主流”（董小川 77）。所以，在风云变幻的六十年代，谢尔比从不良少年转向牧师的决心和不畏世俗的勇气更是彰显了其特立独行的精神，乔治安便被其浪漫幻想所吸引，满怀激情地踏进了婚姻的殿堂。但婚姻并不仅仅是浪漫的情怀，“在现代国家，婚姻家庭不仅是一种文化象征，还是一种社会和法律制度”（王丽琼 105），起到维护社会稳定、传承道德文化的作用。正是乔治安对婚姻的期待与婚姻的社会功能之间的内在冲突导致二人在婚姻中陷入了伦理困境。

除了责任与浪漫的内在矛盾，传统的婚姻性别角色与当代女性意识觉醒之间的冲突也是构成婚姻困境的主要因素。伦理困境是“由于伦理混乱而给人物带来的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冲突”（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1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91.

2 詹姆士是当时美国著名的电影演员，他的电影形象代表了同时代“垮掉的一代”青年的反叛和浪漫。

258)。20世纪60年代的年轻一代对老一辈的传统伦理发起了挑战，婚姻伦理便是其中之一。战后的美国经历了50年代的繁荣，人们的重心逐渐转移到家庭生活中，开始重新审视婚姻及亲密关系，“其中一些态度及行为上的变化，源自战后世界的日益繁荣，以及人们的价值观‘从生存到自我表达’的转变”（斯蒂芬妮·孔茨 299）。这是一个关键转折点，意味着婚姻从社会功能走向个人事务，人们更加追求婚姻中的个人需求和自我表达。

第二次女性主义思潮的发展更是推动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开始重新审视自我在婚姻中的身份。“伦理身份是道德行为及道德规范的前提，并对道德行为主体产生约束，有时甚至是强制性约束”（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4）。传统婚姻对两性关系中的男女的责任和义务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如“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而女性主义思潮的发展逐渐动摇了传统的婚姻模式，妻子们纷纷渴望建构一个符合当代观念的独立女性身份，进而造成传统的性别角色与女性主义思潮倡导的独立女性之间的错位，导致婚姻陷入困境。当勒罗伊沉迷于十字绣、搭积木等不切实际的爱好时，诺玛的母亲认为“那是女人家做的事情”（7），诺玛也对他说“女人情愿要一个闯荡的男人”（18）。这里可以看出，诺玛和她的母亲对于婚姻里的性别角色认识仍是传统的认识，但诺玛又受到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所以当诺玛提出离开时，勒罗伊反问“是不是和妇女解放有点关系？”（19）诺玛一方面急于构建独立的女性身份，但同时又无法调和独立女性与婚姻义务的冲突，由此陷入困境。这并不是她个人的原因，而是社会在各类新兴思潮涌现时不可避免的伦理混乱所导致的。

20世纪60年代的各类思潮影响了当时美国的大部分群体，这些运动虽然在60年代末逐渐式微，但其深远影响力持续到了80年代，逐渐改变了美国人的婚姻观念。《美国人的内心世界》曾报道发现，在1957-1976年间，“美国人对拒绝把婚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接受的人的宽容程度增加了”（罗伯特·N·贝拉等 165）。到70年代末，结婚已不是强制性的选择，婚姻成为一个更加自由的个性化选择，这种全新的社会氛围给予了人们更多的选择空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离婚已不再是难以启齿的事情，诺玛和乔治安选择离开丈夫也是顺应了时代潮流，而让离婚成为可能是婚姻法的变迁和更正。“美国20世纪下半叶的离婚法改革和婚姻家庭的宪法实践，就在很大程度上促生了美国的婚姻家庭危机”（王丽琼 105）。这场改革始于各州的无过错离婚法改革，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所有州均通过了无过错离婚法¹。自此，美国离婚率一路飙升，结婚人数逐年减少。

“这场始于1969年的离婚法改革改变了美国婚姻家庭的本质，使婚姻在美国由‘承载着重要公共利益的制度’转变为‘规制两性关系的私人契

1 在1969年前，离婚法规定只有在夫妻一方有通奸、刑事犯罪、疾病等具体过错时才可申请离婚。但1969年后，加州开始通过了无过错离婚法，即只要夫妻双方自愿，便可离婚。

约’ ”（王丽琼 105-106）。这一转变让婚姻成为两个独立灵魂的自愿结合，也让亲密关系中的伴侣更加注重精神契合度和情感价值。在这种“去制度化婚姻”的大背景下，一旦婚姻中缺乏情感沟通或无法提供情感价值时，夫妻双方便徘徊在责任与个人需求的两难选择中，处于一种身份失衡的拉扯状态。诺玛和乔治安正是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最终选择离开婚姻。

《夏伊洛公园》中的两对夫妻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中年婚姻危机，更是传统婚姻伦理与当代婚姻伦理的冲突。反文化运动和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所带来的深远伦理变革催生了人们婚姻观念的转变。作为伦理革命的见证者，梅森以敏锐的笔触审视了当代婚姻的新形式和新问题。一方面，它给人们带来了自由与解放，摆脱了传统的文化等级制；另一方面，它在煽动人们摆脱桎梏的同时，并没有给出新的伦理标准，导致人们陷入伦理混乱之中。通过刻画80年代的婚姻状况，梅森对1960年代的伦理重构运动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展现出了她在思考两性关系和个人幸福等问题上的深刻性。

Works Cited

- Amato, Paul R. Alan Booth, David R. Johnson and Stacy Rogers. *Alone Together: How Marriage in America Is Changing*. Massachusetts: Harvard UP, 2009.
- 罗伯特·N·贝拉等：《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翟宏彪、周穗明、翁寒松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
- [Bellah, Robert N. et al. *Habits of The Heart: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translated by Zhai Hongbiao, Zhou Suiming and Weng Hanso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 Bentley, Greg. “The Wounded King: Bobbie Ann Mason’s ‘Shiloh’ and Marginalized Male Subjectivity.” *The Southern Literary Journal* 1 (2004): 144-161.
- 博比·安·梅森：《夏伊洛公园》，汤伟、方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
- [Bobbie Ann Mason. *Shiloh and Other Stories*, translated by Tang Wei and Fang Yu. Chongqing: Chongqing UP, 2014.]
- Champion, Laurie. “Bobbie Ann Mason’s (Open-Ended) Marriages.” *The Midwest Quarterly* 1 (2001): 95-111.
- 斯蒂芬妮·孔茨：《为爱成婚：婚姻与爱情的前世今生》，刘君宇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年。
- [Coontz, Stephanie. *Marriage, A History: How Love Conquered Marriage*, translated by Liu Junyu. Beijing: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2020.]
- 董小川：《美国文化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 [Dong Xiaochuan. *American Culture*.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 Eckard, Paula Gallant. *Body and Voice: Maternal Experience in Selected Novels by Toni Morrison*,

- Bobbie Ann Mason, and Lee Smith. 1999.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h.D. dissertation.
- Eicher, David J. *The Longest Night: 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E-book,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1.
- Gitlin, Todd. *The Sixties: Years of Hope, Days of Rage*. New York: Bentam Books, 1987.
- 约瑟夫·希斯、安德鲁·波特：《叛逆国度：为何反主流文化变成消费文化》，张世耘、王维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
- [Heath, Joseph and Andrew Potter. *The Rebel Sell: Why the Culture Can't Be Jammed*, translated by Zhang Shiyun and Wang Weido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4.]
- 麦隆·马格尼特：《梦想与梦魇——六十年代给下层阶级留下的遗产》。北京：文津出版社，2004年。
- [Magnet, Myron. *The Dream and The Nightmare: The Sixties' Legacy to the Underclass*. Beijing: Wenchin Publishing House, 2004.]
- McPherson, James M. *Battle Cry of Freedom: The Civil War Era*. New York: Oxford UP, 1988.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向”，《文学跨学科研究》4（2022）：563-568。
- [—。“The Scientific Turn of Humanities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4 (2022): 563-568.]
- Price, Joanna. *Understanding Bobbie Ann Mason*. Columbia. South Carolina: U of South Carolina P, 2000.
- Sanders, Sandra Ann. “A Less Perfect Union: Bobbie Ann Mason’s ‘Shiloh’ and ‘The Retreat’.” *The Macksey Journal* 99 (2022): 1-7.
- 王丽琼：“婚姻家庭的‘美国病’：个人主义、种族不平等与当代危机”，《文化纵横》1（2023）：104-111+159。
- [Wang Liqiong. “The ‘American Disease’ of Marriage and Family: Individualism, Racial Inequality, and the Contemporary Crisis.” *Beijing Cultural Review* 1 (2023): 104-111+159.]
- 王孝询：“美国内战爆发的政治因素”，《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5（1987）：29-35。
- [Wang Xiaoxun. “Political factors in the outbreak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5 (1987): 29-35.]